赵树理之“驴说”

□陈为人

赵树理一生历经沧桑沉浮坎坷起伏，赵树理的命运折射出共和国文艺的诡谲走向，是回眸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绝好视角。写赵树理的命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切入点。

驴背上的状元

赵树理成名后，他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赵树理降生一百天的时候，家里祖孙三代为他庆贺百日。家人们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有向人借来的银元宝，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碰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住一支笔，一手则紧紧攥住一根赶毛驴的鞭子。赵树理的爷爷见此情景，长长地叹口气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之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华夏文化自古流行这么一种风俗：小孩子满月、百天或周岁之际，陈列各种玩物和生活用具，任孩子抓取，以此来预测小孩子将来的志向和兴趣。这种抓阄近似占卜，对一个人的命运有着某种象征意味。

赵树理早年有这样一些情节，构成了他生命记忆中的“象征”：

赵树理出身尉迟村。尉迟村原名叫吕窑，唐太宗手下有两员开国大将：红脸的秦琼和黑脸的尉迟恭（也叫尉迟敬德）。也就是后来被老百姓神化为门神的二位。李世民做皇帝后，封尉迟恭为“吴国公”。尉迟恭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贞观年间，因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杀了赃官，潜逃出京城长安，隐姓埋名，流落此地。尉迟恭出身贫寒，早年与刘备一样，曾以编织为生。他向村民们传授了编簸箕技术，赵树理的父亲就是闻名乡里的编簸箕能手。后来，吕窑村民为纪念尉迟恭，改村名为尉迟村。村东南河岸上，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尉迟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成为尉迟村代代相传有口皆碑的村史“教材”。尉迟恭成为尉迟村民心中敬仰的偶像。

赵树理的母亲曾经生过几胎，都是女孩，只活了一个。祖父母早就盼着生个男孩承继香火。所以赵树理一降生，两位老人就高兴地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得意”。到孩子五六岁开始读书时，给起了个官名“树礼”，那是本宗室按儒家经典教诲“仁、义、礼、智、信”的顺序排列下来的。1930年从国民党的“自新院”出来后，才改为“树理”，据赵树理自己说：改名是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赵树理的爷爷奶奶信奉“三教圣道会”。三教即指“儒”、“道”、“佛”三圣合一。强调“儒重忠恕，道重感应，佛重慈悲”。赵树理对人说：“我从六岁起，由祖父教我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不让我和其他孩子玩，并且要我身体力行能为我所理解的那些道德行为，例如拜佛、敬惜字纸，走路不左顾右盼、见人要作揖、吃素等。”祖父还教他：“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敬师尊……”“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这一切自然都“随雨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成为赵树理生命的“遗传基因”。

赵树理受祖父母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行善行恶都要记录在案的习惯。早年，是划杠杠，做了好事划竖杠，做了坏事划横杠。后来，改成放豆子，找一瓦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二颗……坏事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在他的罐子里，白豆总是比黑豆多得多。

赵树理从小养成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在路上自己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一定要动手把它搬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要让后来者再绊倒。再比如，在路上遇到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萍水相逢的小孩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

在赵树理的幼年经历中，还有这样一个象征性情节：

为了补贴拮据的家庭开支，在天寒地冻的冬闲季节，赵树理常要赶着毛驴去驮炭。山西人把成块的煤叫做炭。他从尉迟村走到阳城煤窑，驮上炭，运到端氏镇，往返百里，挣几个脚钱买盐买布。每天一早，他在母亲柔声的呼唤和轻轻的摇动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摸索着穿上衣服，走到外屋的灶边，用冷水胡乱洗洗脸，用一块污秽的破手巾擦干，然后蹲在地下，扒几口小米捞饭，喝一碗清水米汤，再揣上几个煮山药蛋。这时，父亲已把毛驴装备完毕，交给他一条小鞭子。

大概正是这些“遗传基因”塑造出这个“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驴背上状元”的作家赵树理。

文化娱乐好比“驴打滚”

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有一段时间在《黄河日报》编辑副刊，当年任《黄河日报》党支部书记的何微，在《对赵树理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讲述了赵树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次，他说了几分钟的一个小段，今天晚会我不唱戏，也不讲故事，讲讲文化娱乐吧。咱们这个晚会，叫做文化娱乐晚会，为啥打日本、闹革命，还要文化娱乐呢？我们做工作，好比毛驴拉碾拉磨，驮炭驮水，一天半晌过来，干活累了，让毛驴喘喘气，歇歇劲儿，卸了驮子，卸了驮架，套包笼头毡都卸了，牵着驴儿在太阳地里转上几圈，转着转着，毛驴就懒洋洋地跪下两条前腿，躺倒在干土地上，美美地打个滚儿，裹上一身浮土，又滚过来，滚过去，滚得四脚朝天，好舒服啊，歇上会儿，浑身上下一抖擞，抖掉满身浮土，蹦起来，喷喷鼻子，翻翻嘴唇，扬起脖子，放开嗓门，鼓着肚皮，胡呵胡呵一叫唤，又精神了，干起活来又是一身劲了。文化娱乐就像驴打滚，没点文化娱乐不行，可是光打驴滚，不干活，就不是只好驴子了。所以做工作，闹革命，都要学会驴打滚。可千万别做打滚驴。人们顿时哄地欢笑起来！然而笑过之后，真正赞同他的人却寥寥无几。

赵树理在这个小段子中，以一个作家的“形象思维”，对文化娱乐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作出独特的阐述。颇有赵树理的语言风格特点。

赵树理把“文以载道”济国安邦经天纬地的神圣事业，竟然比作什么“驴打滚”，难怪当年太行山的文人们认为赵树理是个“俗不可耐”的乡巴佬。

严文井对赵树理有这样的回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还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和一些外国作品的译本（包括林琴南的译作）。他的科学常识很丰富。我这才明白，老赵并不是个“土包子”，他肚子里装的洋货不少。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不知怎么说起了某个人的“桃色新闻”，赵树理一下子联想到契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便详细地讲了那个幽默故事的内容和细节。甚至连巴维尔妻子恶作剧写的那封假情书，都差不多背了下来，逗得大家笑出了眼泪。笑过之后，有人禁不住问：“老赵几时迷上了外国的东西？”

后人对赵树理的创作风格有所误解，认为赵树理就是那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他的创作风格正好吻合了毛泽东对革命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其实，翻阅赵树理的早期作品《打卦歌》《歌生》等，可以看出赵树理既有很深厚的国学底子，对现代西方文学中诸如意识流一类写作手法也运用得驾轻就熟。

赵树理说过这样的话：“读外国作品，总觉得文字别扭，不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在感情上跟它格格不入。”赵树理还说，“翻译的东西读多了，受了影响，说话写东西也变了腔调，这会限制读者的圈子，限制在知识分子中。工农分子读不了。”

赵树理认识到，要达到“教育农民”“唤醒民众”的目的，必须蹚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赵树理说：“我会说两种话，跟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话，跟农民说农民的话。”

早在解放前，丁玲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一次农村的骡马大会，在会上她看了赵树理编的秧歌戏《娃娃病了怎么办》，看完后她写过一篇《记砖窑湾骡马大会》：丁玲在文中虽然也赞扬了赵树理所编的戏在农民群众中受到的热烈欢迎程度，但最后概括性一句话：“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丁玲的话颇代表了赵树理当年在延安文化人心目中的形象。

赵树理显然也知道人们的这些微言非议，但他满不在乎地说：“大家都要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把我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赵树理的志向就是“做一个地摊文学家”。

赵树理还有一句名言：“我写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政治上起作用，人民大众能看得懂。”

赵树理是华夏文学史上真正从农民中走出来，又完全用农民的语言来表现农民生存现状的先驱者第一人。赵树理完全是把自己作为农民这个团体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哀农民之哀，喜农民之喜，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正是他说出“文化娱乐好比‘驴打滚’”的心理潜台词。

千万不要上“头驴”的当

在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数次运动之后，1963年8月31日，赵树理在黄碾公社四清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头驴”的故事，请大家在运动中注意不要上“头驴”的当。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一群一群牧驴，在吃饱草后，牧人们要赶它们去河边喝水，这时，在驴群中，突然会出现那么一两头驴争先恐后往前边跑，它一边跑，一边咬或蹬别的驴，使自己能跑到最前面。在水边占有一席之地。我把这种驴叫作“头驴”。我们在历次运动中，也有个别人要当“头驴”，突出自己，伤害他人，以达到占有一席之地的目的。我们这里有没有这种人呢？我看社会上的现象，在这里也会有的。如果没有，那更好。如果有了，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上“头驴”的当。

赵树理这番话说得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让我们看赵树理在“大跃进”时期，与阳城县委书记的一番对话：

在会上，县委书记首先讲话：“同志们，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的奋斗口号是：粮食亩产超万斤，今年总产翻十番；棉花亩产两千斤……”“轰”的一声，台下的人们被这高指标吓得乱嚷起来，坐在书记旁边的赵树理忍耐不住，笑着打断了他的讲话：“……我看这个要求不实际……”赵树理横档里抡的这一斧子，把个县委书记砍糊涂了，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没见过敢在公众场合反对他的人，他忍住没发作，继续布置他的新指标……赵树理又是半路一斧子：“我看这个指标也太高……”县委书记脸色骤变，怒气暗生，但最后还是按捺下去：“再说第三项……”赵树理又是横空里一斧予以反对。县委书记终于忍耐不住勃然大怒，对赵树理拍桌子吼道：“……照你这么说，大跃进是错了？真是老右倾，绊脚石！”书记这话就说得有了威胁的意味。但赵树理毫不示弱，把桌子拍得比县委书记拍得还响：“不管是老右倾还是绊脚石，你怎么说都行，只要组织上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就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瞎指挥，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还对得起人民的委托吗？”

然而，在当年那种大趋势下，赵树理根本不可能“挽狂澜于即倒”。大会最后还是通过了高指标的生产规划。气得赵树理拍案而起，指着县委领导的鼻子，严厉斥责：“你们这样不顾群众死活的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

犟驴不踢善主

赵树理的家乡人有许多关于驴的话语，比如说：“犟驴”、“毛驴脾气”、“出门遇上灰毛驴”等等。“出门遇上灰毛驴”，“灰”是当地一句土语，表示“灰溜溜”、“黑乎乎”总之带有贬意色彩。是说出门就撞上乱尥驴蹶子，乱发毛驴脾气。

与赵树理共过事的不少干部，说赵树理还真有点犟驴脾气，得随时防他尥蹶子。毛驴的脾气以犟出名，毛驴甚至敢对自己的主子也尥蹶子。但毛驴不踢好人。俗话讲：“犟驴不踢善主。”

让我们略举一例看看赵树理的“犟驴脾气”。1959年冬天，由于赵树理给陈伯达发出了那封被称之为“与彭德怀一文一武遥相呼应，猖狂向党进攻”的万言书，赵树理因此受到批判。批判的理由据称是：“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十一月十八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到会同志都很气愤。”“……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

赵树理在向中国作协所交的书面检查中，说的是这样的话：“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响的锣鼓活跃起来。”

赵树理在批判会上，还说了这样的话：“按照我的观点来检查，你们通不过。按照你们的要求来检查，我自己又通不过。”有在批判会上这么说话的吗？赵树理就是这样的犟驴直脾气。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赵树理的犟驴性格也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现实主义精神与意识形态遮蔽

——重读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王春林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创作时间，是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1945年。赵树理笔下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李家庄”，是晋东南地区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只要熟悉赵树理小说的读者，就都知道，赵树理差不多全部的小说作品，都是以他的故乡晋东南地区为故事背景的。举凡《小二黑结婚》中的“刘家峧”，《李有才板话》中的“阎家山”，《登记》中的“张家庄”等等，都是晋东南地区的普通乡村。更进一步说，这些村庄干脆很可能就是以赵树理自己的出生地沁水县尉迟村为基本原型的。那么，赵树理所欲写出的，又是李家庄怎样的一种变迁呢？首先，要想写出某种“变迁”，就必须拥有一个较为阔大的叙事时间。设若时间过于短暂，那就很难谈得上什么变迁。细读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起始于1920年代末期1930年代初期。这一点，在小说开头处的一句叙事话语中，即可得到确证：“抗战之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抗战爆发于1937年，从这个时间前推八九年，可不正是1920年代末期1930年代初期。到了小说结尾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了。这样算起来，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就差不多达到了十五六年的时间。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一部篇幅只有8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时间的跨度似乎不需要有如此之大，但具体到赵树理的这部小说，因其要具体思考表现“变迁”主题的缘故，设定这样的一种叙事时间，就并非是毫无必要的。

赵树理集中关注表现的，一方面是这个期间李家庄基础政权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村民们在这个期间其实非常艰难的日常生存状态。小说一开始，就把叙事的聚焦点，对准了乡村政权的腐败问题。外来户林县人铁锁与春喜是邻居，双方围绕茅厕旁边一棵桑树的具体归属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本来，这棵桑树应该归属于铁锁一家。但由于春喜是村长兼社首，自然也是本村的一大富户李如珍的本家侄儿，结果，在李如珍的百般庇护之下，铁锁最后只能无奈败诉。请一定要注意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赵树理关于其他无干村民的描写。尽管说如同看庙人老宋这样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都知道这棵桑树应该属于铁锁一家，但面对着李如珍叔侄的淫威，他们却敢怒不敢言：“老宋自然记得，可是他若说句公道话，这个庙就住不成了。”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锁吃了这个哑巴亏。这里，不只是牵涉到了李如珍叔侄平日的淫威霸道，而且也涉及到了外路人与本地人之间一种微妙的区别。就这样，通过一件不怎么起眼的争桑树事件，赵树理就非常巧妙地撕开了进入乡村世界的一个口子。一方面，凸显出了李家庄不无尖锐的阶级冲突，另一方面，则微妙地揭示出了外路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某种差异和隔阂。如果从所谓现实主义精神的具备这个角度来说，赵树理小说的这种巧妙的开头方式，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这个开头，认真地捡拾赵树理的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少地方，也都突出地体现着作家一种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比如，小说关于王安福老汉这个形象的刻画描写，就特别引人注目。王安福老汉是福顺昌的掌柜，属于乡村世界里乡绅阶层的一员。作为李家庄的一个商业经营场所，福顺昌当然要放债谋利；“铁锁托修福老汉和杨三奎到福顺昌借钱，王安福老汉说柜上要收茧，没有钱出放，零的可以，上一百元就不行。”尽管王安福老汉对于铁锁的遭遇颇有同情，但福顺昌毕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无法违忤。不只是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开头处，面对着铁锁的不幸遭遇，王安福老汉讲出的一番话：“说真理，他们卖给人家的就是这个茅厕呀！人家用的那一个，真是他爹老张木匠在世时候打的。我想这你也该记得！”尽管记得，但即使是如同王安福这样颇有些财势的乡绅，却也不敢出面替铁锁说话辩护。这一细节，一方面说明了李如珍叔侄素日的霸道，另一方面，却也说明着王安福老汉的谨小慎微与克制隐忍。若非如此，他的福顺昌恐怕也无法经营到现在这种地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谨小慎微的普通乡绅，在抗战爆发之后，面对着入侵的强寇，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毁家纾难的慨然决定：“我老汉主张干实事，虽说不是个十分有钱的户，可是不像那些财主们一听说出钱就吓跑了。会里人真要有用钱的地方，尽我老汉的力量能捐多少捐多少！就破上我这个小铺叫捐款！日本鬼子眼看就快来抄家来了，那还说这点东西？眼睛珠都快丢了，那还说这几根眼睫毛啦？”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就已经充分地凸显出了王安福老汉的民族正义。把他性格中的这个层面，与前面的相关描写结合起来，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乡绅形象自然也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其实，还不只是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除此之外，赵树理在小说中的其他一些艺术处理，也还都能够称得上是切实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比如，在铁锁不仅桑树的官司败诉，而且还因为不服气要上告再次被李如珍他们整得差不多快要家破人亡的时候，赵树理特别安排铁锁离开了李家庄，北上省城太原去谋一条生路。虽然从表面上看，作家的这样一种艺术设计，似乎远离了李家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似乎背离了作家的艺术题旨，但在我看来，赵树理的这样一种艺术设计，其实有其深层的用意所在。这样一种艺术处理的妙处，就突出地表现为通过铁锁在太原的生活轨迹，极富艺术性地为作家自己所欲探究表现的“李家庄”的“变迁”，提供了一种必要而且宏阔的时代背景交待。有了铁锁在太原的这一段生活历程，就使得发生在“李家庄”的这一番“变迁”，具有了根本的时代依据。再比如，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所具体描写表现的这个叙事时间，正是后来被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一个历史时期。简单地还原一下这个时期的山西历史，你就不难发现，实际上，阎锡山正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内外交困状态之中。对于阎锡山来说，真正可谓是四面受敌。外有日寇的入侵，鉴于民族大义，阎锡山当然要坚决抗日。内有来自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共产党的八路军的强大压力。面对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步步紧逼点滴渗透，阎锡山也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关于这一点，赵树理在小说中其实已然有所涉及。“他说阎司令长官说过：‘我只要孝子不要忠臣！’就是说谁能给阎司令长官办事，阎司令长官才用谁。对共产党自然也是这样，要能利用了共产党又不被共产党利用。”“在阎锡山看来，山西是他自己的天下，谁来了都应该当他的‘孝子’，眼看好多地方，孝子们没有守住，被日本人夺去；孝子们又不会收复，又被八路军收复了，他如何不着急？”揆诸于当时的那一段历史，应该说赵树理的这样一种描述是非常真切的。

从以上我们对于《李家庄的变迁》中若干重要细节所进行的分析来看，说赵树理是一个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当然是能够成立的一个结论。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以上的分析对象，仅仅只是赵树理这部小说的若干片段而已。如果从小说的整体思想艺术倾向来看，说赵树理是一个具有突出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恐怕就是一种难以成立的学术结论。只要我们认真地重读一下这部小说，那么，你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赵树理在这部小说当中，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价值立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赵树理的所谓“变迁”，实际上指的正是李家庄的基层政权由李如珍他们向铁锁、冷元、二妞他们的转移。小说一开始，铁锁他们这些普通的农民处于李如珍他们的压榨欺辱之下，等到小说结束的时候，李如珍他们已经被镇压被取代，而取代了他们的，恰恰是曾经被他们严重欺辱过的铁锁冷元他们。之所以会是如此一种情形，与作家赵树理自己所坚持的那样一种鲜明的政治价值立场，显然存在着过于紧密的内在联系。而这，自然也就牵涉到了赵树理的民间立场与政治观念所必然发生的尖锐冲突。

从根本上说，赵树理乃是游离于民间立场与政治观念之间的一位作家。我们必须认识到，作家赵树理，一方面是农民文化或者说民间立场的自觉守护者，另一方面，也还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这样表达过对于赵树理的一种基本看法：“这样，农民文化自觉辩护者的赵树理与政治意识形态自觉代言人的赵树理，事实上也就处于了一种格外痛苦的内心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农民文化辩护者的赵树理，分外敏感地发现了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对于农民的利益及其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但在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赵树理，又无法对抗这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农村政策，甚至于还得违心地去贯彻执行这些农村政策。完全可以想象，此时赵树理的内心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痛苦状况。”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坚持自己的上述判断，坚持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作为农民文化的自觉守护者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样两个互相冲突着的赵树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赵树理之艺术成功，在此，赵树理之艺术缺陷，也同样在此。具体到他的这一部《李家庄的变迁》，作家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整体层面上坚持一种难能可贵的足够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说到底，还是一种先验的政治价值立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遮蔽，导致了赵树理没有能够把这种殊为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彻底地贯彻体现到他的《李家庄的变迁》之中。而这，也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依然不能不引为憾事。

丛刊2012年第9期目录

文学史研究
浅议民国传统诗话的现代品质 …… 彭继媛
“文白之争”中的第三种声音：“凡庸的折衷论” …… 刘 泉
东北地区话剧源起新考 …… 李艳葳
日本思想史视角下的鲁迅研究
——兼论“伊藤鲁迅”与丸山真男的精神联系 …… 柴红梅 刘 伟
中国易卜生传播史上的鲁迅与胡适 …… 陈玲玲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的文体特征 …… 付 平
钟理和研究中“原乡”与“同姓不婚”的理解偏差 …… 蔡登秋
作家与作品
“自由”：丁玲早期小说创作的精魂
——以《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为中心考察秦林芳
论凌叔华的自由主义文学观 …… 冯慧敏 谢昭新
《朝花夕拾》：“回忆”的叙述学分析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 郑家建 赖建玲
神话的还是历史的？——论茅盾神话小说的艺术追求 …… 张 岩
论废名田园小说的厌世心理与叙述困境 …… 席建彬
沈从文眼中的基督教文化 …… 龚敏律
张爱玲的“传奇”小说观 …… 程丽蓉
“茶馆”重塑与老舍1949年后的创作 …… 凤 媛
论杨显惠的“纪事”系列小说 …… 哈建军
激进与保守动态平衡下的民间立场——从张炜的“保守主义”标签谈起 …… 文 娟
晚清文学研究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的文学描写和文化反思 …… 张 弛
黄遵宪书面语变革实践的路径、因果与影响 …… 周晓平
刘大白研究
刘大白散佚的几篇诗文考 …… 刘家思
论刘大白旧体诗创作的两次转型 …… 刘桂萍 周桂华
书评
冯铁和他的现代文学研究——读《在拿波里的胡同里》 …… 李 怡
元理论视域下的文学史理论研究
——评温潘亚《追寻文学流变的轨迹——文学史理论研究》 …… 孙晓东
编后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